

双重超越的困境

——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与政策刍议

王 栋

内容提要 在理论和政策命题上,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面临着双重困境:一方面,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化工作尚未完成,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处于“贫困”状态;同时,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又面临着沃尔特、奈等提出的“回归政策”命题的挑战。超越这一双重困境的可能路径包括:区分政策导向型的“政策相关性”理论及知识导向型的“非政策相关性”理论,提倡实证导向的研究,提高政策研究的知识性和学术性,复兴、重建历史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的地位,以及注重对未来决策者的培养。

关键词 国际关系理论 中国外交 政策制定者/决策者 双重超越

作为一门相对较年轻的学科,国际关系学自从诞生之初就面临着一个古老的命题:即理论与政策之间的关系。一定意义上,国际关系理论与外交政策实践之间的关系也是社会科学(如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中理论与政策关系的映射。理论之与政策,究竟有没有作用?起到了什么作用?决策者之与理论,究竟该持何种态度?学者对于政策,又应该持何种态度?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者就开始有意识地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①美国国际关系学者亚历山

* 王栋: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博士。(邮编:100871)

** 本文得益于王缉思、袁明、朱锋、周桂银及其他参加“国际问题研究的学术性与政策性”研讨会的学者的批评与建议。本文在资料搜集上还得到姜鑫的协助,在此一并致谢。当然,所有谬误概由笔者承担。

① 休·赫克洛(Hugh Hecllo)于1972年发表的有关政策分析的评论文章对20世纪60年代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界的相关努力进行了最早的综述与点评,参见Hugh Hecllo,“Review Article: Policy Analysis,”*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2, No. 1, January 1972, pp. 83-108.

大·乔治(Alexander L. George)发表于1993年的《架起跨越鸿沟的桥梁:外交政策中的理论与实践》(*Bridging the Gap: Theory and Practice in Foreign Policy*)一书则标志着学术界对这一命题的探讨开始进一步系统化和深化,随之一系列专著和研究纷纷出现,有关政治学、国际关系理论与政策关系的文献逐渐成型,始有蔚为大观之势。^① 最近几年,国际关系学者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M. Walt)和约瑟夫·奈(Joseph S. Nye, Jr.)等又著文批评美国国际关系学界过于重视理论与方法,忽视研究的政策相关性(policy relevance),从而再次引发有关国际关系理论与政策关系的热烈讨论。^②

随着中国国力日增,逐渐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中国外交也日渐转型。此时,

① 重要的文献择其要者有如下: Alexander L. George, *Bridging the Gap: Theory and Practice in Foreign Policy*, Washington, D. C.: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1993; Christopher Hill and P. Beshoff, eds., *Two World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cademics, Practitioners and the Trade in Ideas*, London: Routledge, 1994; Philip Zelikow, "Foreign Policy Engineering: From Theory to Practice and Back Aga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8, No. 4, Spring 1994, pp. 143-171; David D. Newsom, "Foreign Policy and Academia," *Foreign Policy*, No. 101, Winter 1995, pp. 52-72; *World Politics* 专刊, "The Role of Theory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A Symposium," *World Politics*, Vol. 48, No. 19, October 1995; Colin Elman, "Horses for Courses: Why NOT Neorealist Theories of Foreign Policy?" *Security Studies*, Vol. 6, No. 1, Autumn 1996, pp. 7-53; Kenneth N. Waltz,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s NOT Foreign Policy," *Security Studies*, Vol. 6, No. 1, Autumn 1996, pp. 54-57; Stephen M. Wal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ne World, Many Theories," *Foreign Policy*, Spring 1998, pp. 29-46; Stephen M. Walt, "Rigor or Rigor Mortis? Rational Choice and Security Studie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3, No. 4, Spring 1999, pp. 5-48 以及 Walt 文章引起的激烈争论,参见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4, No. 2, Fall 1999, pp. 5-130; Paul A. Sabatier, ed., *Theories of the Policy Process*,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99; Joseph Lepgold and Miroslav Nincic, eds., *Being Useful: Policy Relevanc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0; Joseph Lepgold and Miroslav Nincic, *Beyond the Ivory Towe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 Issues of Policy Relevanc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1; *Fostering Human Progress: Social Science and Behavioral Science Research Contributions to Public Policy*, Washington, D. C.: Consortium of Social Science Association, 2001; Bruce Jentleson, "The Need for Praxis: Bringing Policy Relevance Back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6, No. 3, Spring 2002, pp. 169-183; Stanley A. Rensson and Deborah W. Larson, eds., *Good Judgment in Foreign Policy: Theory and Application*, Lanham, M. 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03. 国内学术界对于这个问题进行探讨的并不多,较有代表性的有苏长和、彭召昌:《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贫困:对近20年国际关系学在中国发展的反思》,《世界经济与政治》1999年第2期,第15—19页;王缉思:《国际政治研究中的理论与政策》,《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1期,第20—21页;李少军:《国际关系理论与现实》,《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2期,第20—25页;许嘉等:《“英国学派”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时事出版社2008年版,序言,第9—13页;王军、但兴悟:《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四十年》,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第378—386页。

② 参见: Stephen M. Wal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ory and Polic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8, 2005, pp. 23-48; Joseph S. Nye, J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Relevance of Theory to Practice," in Christian Reus-Smit and Duncan Snidal,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xford, U. 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 648-660; Joseph S. Nye, "Scholars on the Sidelines," *The Washington Post*, April 13, 2009, A15. 此外,2006年美国还成立了以美国亚洲政策为重点,致力于跨越学术界和政策圈鸿沟的刊物《亚洲政策》(*Asia Policy*)。其创刊号刊登了由傅高义(Ezra F. Vogel)、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沙特(Robert Sutter)等兼具学术背景和政策制定经验的亚洲问题专家发表的专论,参见 "Special Roundtable: Bridging the Gap Between the Academic and Policy Worlds," *Asia Policy*, No. 1, January 2006, pp. 1-41.

深入思考国际关系理论与外交政策的关系,其重要性自不待言。然而,证诸中国的情景,在这一命题上我们面临着双重困境。一方面,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化工作“革命尚未成功”,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处于“贫困”状态:如缺乏原创性、拾人牙慧、亦步亦趋,永远跟在别人后面,是理论(多为西方的)的消费者而无法成为理论的生产者,甚至成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奴隶”,理论化工作仅至于引介国外的理论等等。^①同时,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又面临着沃尔特、奈等提出的“回归政策”命题的挑战。如果将美国国际关系学界提出“回归政策”比做“现代化”实现之后的“后现代”命题,那么中国国际关系学术界现在面临的困境与挑战,是如何在“现代化”尚未完成的情况下应对“后现代”命题,也即如何实现双重超越。

一、理论与政策的关系:紧张与隔阂

外交政策制定者通常存在轻视理论的态度。在中文的语境里,“理论”一词也多多少少含有空谈、迂腐、脱离实际、书生之见等等的负面意思,因而有“空头理论”一词。乔治曾经非常形象说道,当他采访的政策制定者一听到理论二字,“其眼神马上变得黯淡无光”。^②曾在肯尼迪政府时期任助理国防部部长的保罗·尼采(Paul Nitze)就曾认为“作为现实政策运作的指导,”美国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大多数政治学、国际关系理论“如果不是起反作用的话,也只具有有限的价值”。^③但是正如奈指出的,在实践中,完全不需要理论是不可能的。面对纷繁芜杂的现实世界,一个人至少需要有关原因与结果的最初步的理解,并且需要以一定方式对现实进行简化和解释。如果不加以简化的话,人们无法对即使在过去一小时发生在身边的事进行描述和理解。^④持类似观点的学者还有盖瑞·金(Gary

① 近年来,国内学者对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不足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与反思。可以说这种批判与反思标志着中国国际关系学自我意识的觉醒,也为学科的进一步发展成熟奠定了心理与知识基础。参见苏长和:《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贫困:对近20年国际关系学在中国发展的反思》;门洪华:《关于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现状的评估报告》,《欧洲》2002年第3期,第90—105页;任晓:《理论与国际关系理论:一些思考》,《欧洲》2000年第4期,第19—25页;张睿壮:《我国国际关系学科发展存在的若干问题》,《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5期,第70—73页;王义桅:《为什么没有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1期,第21—22页;苏长和:《为什么没有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国际观察》2005年第4期,第26—30页;王逸舟:《试析中国国际关系学的“进步”:几点批评与思考》,《外交评论》2006年第3期,第34—40页;李巍:《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中的“理论进步”与“问题缺失”》,《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第9期,第23—30页;秦亚青:《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进步与问题》,《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11期,第13—23页;周方银、王子昌:《三大主义式论文可以休矣:论国际关系理论的运用与综合》,《国际政治科学》2009年第1期,第79—98页。

② Alexander L. George, “Foreword,” in Leggold and Nincic, eds., *Being Useful: Policy Relevanc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pp. ix-xvii.

③ 转引自 Ny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Relevance of Theory to Practice,” p. 649.

④ 同上书, p. 648.

King)、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悉尼·沃尔巴(Sidney Verba)及詹姆斯·罗森诺(James Rosenau)。罗森诺甚至打了一个形象的比方:要求国际关系研究者描述一个事件的所有向度,就好比要求地理学家绘制一幅和现实世界尺寸一样大小的地图。显然,没有任何地理学家能够绘制出这样一幅“地图”。因此,人们必须发展出什么是重要的及什么是不重要的观念,并以此为基础对复杂的现实进行简化。罗森诺认为,当人们对现实的繁杂细节进行选择 and 取舍的时候,理论化(theorizing)就此开始。^① 沃尔特也指出:即使是对“理论”嗤之以鼻的政策制定者,也必须依赖于有关世界是如何运作的(虽然经常是不言而喻的)观念以决定采取何种行动。事实上,“有关政策的争议通常是基于有关塑造国际后果的基本力量的更加根本性的分歧”。^②

可以说,任何一个理性的人都或有意或在潜意识中运用“理论”来理解其周围的现实,并以此指导其行为。决策者也不例外。正如认知学派的创始人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指出的,决策者通常必须在充满不确定和模糊信息的条件下做出重大而困难的决定,因而有理由相信决策者是理性的,具有复杂思维,并且具有了解其所处环境的动机。一定意义上,决策者就好像实验室里的科学家一样,寻求对其所处环境的理性分析。^③

对一些西方学者来说,理论和政策之间的隔阂是一件好事。他们认为,学者越追求政策相关性,就可能越难以维持“知识的正直”(intellectual integrity)。^④ 当然,这里隐含的一个假定是真理与权力、理论与政策之间存在天然的紧张关系。这一假定无疑与我们的常识与经验相符。显然,无论在任何体制环境下,政策制定背后主导的政治意志和目标都有可能和学术性理论研究追求真理的目标产生差异、龃龉甚至碰撞,国外如此,中国就更不例外。譬如,建国初期马寅初的“人口论”虽然从学术标准上看更接近真理,但却受到政治意志的批判和否定,遑论影响政策的制定。更加等而下之的是,存在着学者根据政治风向,见风使舵,牺牲学术诚实的危险。而对于中国国际关系研究来讲,长期以来由于强调服务于现实政策,深受意识形态主导和影响,学术独立性无从谈起。或许正因为如此,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大量引进西方理论的努力在不少学者看来起到了使中

① See James N. Rosenau, *Thinking Theory Thoroughly: Coherent Approaches to an Incoherent World*, Boulder, C. O. : Westview, 1995, pp. 2-4; Gary King, Robert Keohane, and Sidney Verba, *Designing Social Inquiry: Scientific Inference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Princeton, N. J.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42-43.

② Wal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ne World, Many Theories,” p. 29.

③ 罗伯特·杰维斯:《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秦亚青译,导言,第32—33页。

④ Hill and Beshoff, eds., *Two World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cademics, Practitioners and the Trade in Ideas*, p. 16. 但也有美国学者认为现实世界相关性(real-world relevance)应当是评价一个理论是否属于“好理论”的标准之一;一个好的理论应当能够产生有用的政策建议。参见:Van Evera, *Guide to Methods for Students of Political Science*, pp. 20-21.

国国际关系学“去政治化”，超越“时事追踪”型的阶段，并使国际关系学真正成为一门“学问”的重要作用。^①但不可讳言，即使时至今日，理论为政策做诠释、注脚，以“学术研究”论证政策的正确与重大意义在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中仍然不绝如缕，甚至因政治、文化传统的影响，一定程度上“内化”成为“自觉”约束学者学术思维和行为的“规范”。因此，从这个逻辑上来讲，维持理论与政策的区隔是有益的，能够有助于维持学术的独立性和价值。

不少美国学者指出，学术与政策两种文化显然是格格不入的。学者具有政策制定者所不具有的“奢侈的自由”，即学者致力于发现真理，因创造性的研究赢得赞誉而不必顾忌政治考虑，可以按照自己的兴趣选择想研究的问题，按照自己的时间表来完成研究，论文提交的截止日期过了之后还可以要求再延长，等等。^②但是政策制定者就完全不具有这种自由了。任何一个政府部门的政策制定者都面临着巨大时间压力之下做出决策的挑战。曾经担任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官员的亚洲问题专家傅高义就很形象地描述政策制定者每天所要面临的压力：必须要回复各种信息，每天都必须完成的各种报告，必须取消既定会议以安排上级临时布置的会议，必须应付来自上级提出的各种（有时是无甚道理的）指令，必须知会同僚最新的内部信息，以及必须赶着截止日期之前准备好某位领导人的演讲稿。^③李侃如则以他自己的经历总结道：对任何一个希望推动某项政策的政策制定者而言，他必须花费巨大时间和精力理解美国的政策利益和外国政府方面起作用的相关因素，以总统能够支持的方式就某一问题提出建议，采取必要步骤在官僚体制内部达成必需的共识，并且最后进行有效的实施（如进行通话、准备会议、起草备忘录、布置各项任务等）。就连进行一个中美元首通话也不是通常所理解的拿起电话就拨那么简单，而是要涉及层层审批、协调各方，耗费巨大精力的事情。^④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即使是决策高层也概莫例外。譬如，周恩来总理就曾私下坦言：“我一天到晚忙于处理日常工作，实在挤不出时间过细地考虑天下大事。”^⑤因此，政策制定者可以说每天围绕着各种具体的甚至是突发性的议题疲于奔命，在这种情况下很难想象政策制定者通常会有闲暇阅读学者的大部头著作或者动辄数十页的学术文章。^⑥

有趣的是，美国国际关系理论与外交政策的这种高度紧张、乃至敌对的关系是

① 李巍：《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中的“理论进步”与“问题缺失”》，第24页。

② Ezra F. Vogel, "Some Reflections on Policy and Academics," *Asia Policy*, No. 1, January 2006, p. 32.

③ Vogel, "Some Reflections on Policy and Academics," p. 31.

④ Kenneth Lieberthal, "Initiatives to Bridge the Gap," *Asia Policy*, No. 1, January 2006, pp. 11-12.

⑤ 熊向晖：《历史的注脚：回忆毛泽东、周恩来及四老帅》，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版，第177页。

⑥ Ny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Relevance of Theory to Practice," p. 654.

比较晚近才发生的。^① 上溯数十年之前,美国国际关系学术界赫赫有名的学者如阿诺德·沃尔弗斯(Arnold Wolfers)、麦乔治·邦迪(McGeorge Bundy)、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等都或直接或间接的参与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② 基辛格、布热津斯基的“学而优则仕”的例子就更是广为人知。而以美国外交政策制定的重要部门、美国国务院的政策规划司为例,从乔治·凯南1947年4月就任第一任司长以来,政策规划司历任司长之中学者出身或者具有学术背景者不在少数。凯南以降,罗伯特·鲍伊(Robert Bowie)、沃尔特·罗斯托(Walt Rostow)、安东尼·莱克(Anthony Lake)、保罗·沃尔福威兹(Paul Wolfowitz)、斯蒂芬·博斯沃思(Stephen Bosworth)、莫顿·哈尔珀林(Morton Halperin)、詹姆斯·斯坦伯格(James Steinberg)、斯蒂芬·克拉斯纳(Stephen Krasner)等皆是个中翘楚。可见,美国国际关系学界曾经一度并不认为参与政策制定甚至“入仕”有何不妥。但是,随着20世纪60年代之后,科学行为主义逐渐取代传统主义,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日益科学化、实证化,这种理论与政策“和谐相处”的局面就逐渐被打破了。科学行为主义的兴起加大了本已存在的学术和政府两种文化之间的隔阂。

科学行为主义大潮之下数理统计、形式模型(formal modeling)、博弈论等工具在美国国际关系学的广泛应用使得这一学科的语言进入障碍大大升高。政策相关性不再是学术界所推崇的标准,学者们醉心于抽象、深奥、并且形式优美的理论研究。美国国际关系学科逐渐形成多少带有封闭性和自命清高的自我意识。对形而上的过分偏好导致与政策日益脱节,乃至形成对政策的偏见。学院派的学者们使用外人无法理解的语言撰写只有他们自己才会阅读的理论文章,大量使用统计、形式模型、博弈论等数理工具,瞧不起形而下的政策研究;而这一切反过来则无疑加深决策者对国际关系理论的蔑视和敌意。正是这种理论与政策之间日益扩大的鸿沟引起了乔治·沃尔特和奈等学者的忧虑,因此提出了“回归政策”的命题。

二、为什么中国外交需要理论

好的理论能够帮助决策者做出明智的决定,譬如冷战初期发展起来的威慑理论对于美国在冷战以及后冷战时期制定很多有效的军事和外交政策起到了至关重

^① 学者通常假定在政策相关性/效用与理论抽象性/复杂性之间存在紧张与对立。唯一的例外可能是,在20世纪50—60年代安全研究的“黄金时期”,博弈论和威慑理论的发展同时在理论的创造性和复杂性及政策相关性两方面取得高度成就。不过除此之外,国际关系(包括安全研究)研究中再没有出现过理论抽象性、复杂性和政策相关性同时高度发展的知识进程。参见:Leggold and Nincic, *Beyond the Ivory Tower*; Hill and Beshoff, eds., *Two World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le Waver and Barry Buzan, “After the Return to Theory: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of Security Studies,” in Alan Collins ed., *Contemporary Security Studies*,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387-388.

^② Ny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Relevance of Theory to Practice,” p. 650.

要的作用；而错误的理论（或者假定）则有可能带来政策失误乃至灾难，如“多米诺”骨牌理论是导致美国决策失误、陷入越战泥潭的重要因素。

根据斯蒂芬·冯·埃弗拉（Stephen Van Evera）的定义，一个理论是对一组现象进行描述并对其原因和影响进行解释的普遍性陈述；理论由前提条件/假定，因果法则/假设以及解释组成。^①然而，在中国的语境中，长期以来，由于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理论被理解为意识形态或者指导行为的思想原则。正如毛泽东的一个著名论断：马克思主义看重理论，不在于理论能够帮助人们“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理论“能够指导行动”，能够帮助人们利用“这种对于客观规律的认识去能动的改造世界”。^②在1949年以来的中国外交实践中，中国领导人曾经提出为数不少的“理论”，如“一边倒”、“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三个世界”、“一条线”，等等。毋庸置疑，这些“理论”有着强烈的意识形态导向和实用倾向，更多的是对外交政策的指导而不是社会科学意义上观察、理解世界事务的解释性工具。^③

改革开放30年以来，随着中国国力日增和日益融入国际体系，中国的战略、安全、经济等利益不断扩展和延伸，同时面临的战略和外交挑战也越来越错综复杂。这种局面使得中国“对国际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的渴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紧迫而现实。”^④那么，中国外交是否需要解释性范畴的国际关系理论呢？对这一问题，外交决策高层自身的阐述无疑最具权威性和启发意义。在一篇有关中国国际战略研究的精辟评论中，中共中央外事办公室副主任裘援平明确指出，解释性范畴的理论研究过去受到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轻视乃至“不屑”，但是在实际外交工作中，这种研究“同样具有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裘援平提出：“现在的对外交流和战略对话需要加强思想性和理论性，需要破解一些战略和理论难题，甚至需要理论创新发展……中国作为一个快速兴起的大国，没有一套自己的理论是不行的。”^⑤裘援平在这里所说的“理论”、“理论性”显然已经不完全是传统的具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理论”概念。虽然从政策需要的角度出发，裘援平仍然注重理论对于外交实践的指导作用，但却明确强调理论的学术性，肯定解释性理论的价值。

从冷战结束之后的中国外交实践来看，很多国际关系理论概念如全球化、相互

① Stephen Van Evera, *Guide to Methods for Students of Political Science*,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7-8.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2页。

③ Wang Jisi,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 Study of Chinese Foreign Policy," in Thomas W. Robinson and David Shambaugh, eds., *Chinese Foreign Policy: Theory and Practic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482-487.

④ 裘援平：《关于中国国际战略研究的若干看法》，王缉思主编：《中国国际战略评论2009》，北京：世界出版社2009年版，第6页。

⑤ 同上书，第2.5页。

依存、国家利益、多边外交、安全困境、非传统安全、非零和博弈等逐渐从学术话语迁移、渗透并最终进入政策话语。这也提供了国际关系理论事实上影响中国外交政策的初步经验证据。

三、国际关系理论对于外交政策制定的作用

那么,国际关系理论之于外交政策制定,究竟有什么作用呢?

回答这一问题,一个好的办法是区分不同类型的学术研究。按照政策相关性,有学者区分了四种类型的学术研究:政策相关性最低的普遍性理论,与政策联系较为紧密的经验性的理论分析、案例分析,以及政策相关性最强的直接的政策分析和建议。^①另外,一份2009年2月发布的对全世界2700多名从事国际关系研究的学者进行的调查按照研究方法把国际关系研究做了更细致的区分。^②这一调查显示,对外交政策决策者最有用的研究类型依次是地区研究、政策分析、当代案例研究及历史性案例研究,而对决策者最没有帮助的则是形式模型(formal model)和理论分析(如下表)。^③

不同类型国际关系研究对政策制定的作用

(非常有用=3,有点用=2,不太有用=1,没有任何用处=0)

理论分析	量化分析	政策分析	地区研究	历史性案例研究	当代案例研究	形式模型
1.40	1.64	2.28	2.31	1.85	2.22	0.97

资料来源:Richard Jordan et al., *One Discipline or Many? —TRIP Surve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Faculty in Ten Countries*, The College of William and Mary, February 2009, p.56.

不少学者认为,普遍性理论如结构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等试图使用相对较少的变量(如权力、极、机制类型等)得出具有较广覆盖范围的法则,但这些普遍性法则往往具有高度抽象性,并通常以概率形式陈述,因而对政策制定往往没有什么直接的指导作用。能够对政策制定产生较好作用的是所谓的“中程”理论(Middle-range Theory)。中程理论通常对普遍性理论施加一定限定条件,其适用范围更

① Leggold and Nincic, *Beyond the Ivory Tower*, p. 68.

② 这一项目全称为“教学、研究和国际政策”项目(Teaching, Research and International Policy Survey,简称TRIP),是由威廉和玛丽学院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研究所举行的针对从事国际关系教学与研究的学者进行的大型跨年度跨国调查。这一调查从2005年开始,涵盖10个国家和地区,并将继续扩大调查范围。参见:Richard Jordan et al., “One Discipline or Many? —TRIP Surve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Faculty in Ten Countries,” The College of William and Mary, February 2009.

③ 最理想的数据应当是对各国政策制定者进行调查获得的直接信息。但是,这种调查实际操作难度很大。另一方面,尽管作为知识理论的“生产者”,国际关系学者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与学术研究成果的“消费者”,也即政策制定者的视角并不相同,但却也相当程度上能够反映和揭示国际关系学术研究对政策制定的作用。

为狭窄,但却更接近政策规划与制定所需的知识类型,具有更大的政策相关性。^①譬如,柯庆生(Thomas Christensen)、杰克·斯奈德(Jack Snyder)和兰多尔·施韦勒(Randall L. Schweller)等人的所谓“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其实就可被视为中程理论。这些学者从沃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出发,但对其普遍性结论施加一定限定条件:通过考察结构性变量如何与非结构性变量(如军事技术、对威胁的知觉、行为体偏好、国内政治等)产生互动,追问什么条件下国家会采取制衡(balancing)、见风使舵/追随(bandwagoning),或者推卸责任(buck-passing)的行为。^②

诚然,无论何种理论或知识,都只是政策分析的助手,无法取代决策者在选择某项政策所要做的判断。决策者做出这些判断往往依据的是直觉、经验而不是某项国际关系或者外交政策理论。^③尽管如此,理论仍然对政策制定起到了重要作用。归纳起来,主要有如下几点:^④

首先是诊断(diagnosis)。理论能够帮助决策者评估他们所面临问题的性质、观察到的趋势及形势发展的最初预警迹象。面对来自各种渠道的数量众多但经常是模糊不清的信息,决策者的一项重要工作是从中发现特定模式或规律,找出重要因素,并建立因果联系。^⑤

正如沃尔兹指出的:在无政府条件下,国际体系充满着不确定性,国家往往无法确知对手的意图,并且即使知道其今天的意图是什么,也“无法肯定对方将来的

① George and Bennett, *Case Studies and Theory Development in the Social Sciences*, pp. 265-269; Bruce W. Jentleson and Andrew Bennett, “Policy Planning: Oxymoron or Sine Qua Non for U. S. Foreign Policy?”, in Renshon and Larson, eds., *Good Judgment in Foreign Policy: Theory and Application*, pp. 222-224. 乔治和本内特认为学者不应当把精力放在发展所谓的外交政策普遍性理论,而是应当集中关注外交政策行为中遇到的许多普遍性问题(generic problems),如威慑、强制外交、危机管理、战争终结(war termination)、预防性外交、调停、和解、合作等。参见:George and Bennett, *Case Studies and Theory Development in the Social Sciences*, p. 268.

② George and Bennett, *Case Studies and Theory Development in the Social Sciences*, p. 268. 柯庆生、施奈德和施韦勒的研究参见:Thomas Christensen and Jack Snyder, “Chain Gangs and Passed Buck: Predicting Alliance Patterns in Multipolarit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4, No. 2, Spring 1990, pp. 137-168; Randall L. Schweller, “Bandwagoning for Profit: Bringing the Revisionist State Back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1, Summer 1994, pp. 72-107.

③ 这些判断往往涉及决策者在决策过程中所必须面对的取舍(trade-off):譬如,决策质量与采取某项政策所需政治、官僚支持,以及对时间和政治、政策资源的有效管理之间的取舍;有关特定政策行为的政治副效应和机会成本的取舍;有关不同政策选项的效用和可接受的风险的取舍;有关在政策目标、效果等做出妥协还是尽量追求最优化的取舍,等等。从根本上来讲,这些关于取舍的判断是政治性的,也有可能是认知的或是心理的。参见:George and Bennett, *Case Studies and Theory Development in the Social Sciences*, pp. 276-277; George, *Bringing the Gap*, Chapter 2; Renshon and Larson, eds., *Good Judgment in Foreign Policy: Theory and Application*; 阿诺德·沃尔弗斯:《纷争与协作:国际政治论集》,于铁军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引论,第8页。

④ 乔治、本内特、詹特森等都认为理论对政策的主要功用是诊断和提供处方,沃尔特则认为除此之外,理论对政策还有预测的功能。参见:George and Bennett, *Case Studies and Theory Development in Social Sciences*, p. 277; Jentleson and Bennett, “Policy Planning: Oxymoron or Sine Qua Non for U. S. Foreign Policy?” p. 225; Wal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ory and Polic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 29-33.

⑤ Jentleson and Bennett, “Policy Planning: Oxymoron or Sine Qua Non for U. S. Foreign Policy?” p. 225.

意图和行动”。^①譬如,朝鲜发展核武器的真正意图究竟是什么,是为了国家安全、巩固政权需要,还是真正想成为核国家,抑或兼而有之?朝鲜是否愿意放弃核武计划?如果是,那么什么条件下朝鲜会愿意弃核?抑或朝鲜根本就不愿意弃核,参加六方会谈的动作只是虚与委蛇,拖延时间,试图“明修栈道、暗渡陈仓”,最终成为核国家。又或者,朝鲜采取的其实是更加“机会主义”的策略,其拥核决心还受外界压力大小及弃核可获得的利益等因素的影响。对朝鲜发展核武器意图的诊断,显然对于评估和平解决朝鲜核危机的可能性,以及各方应对策略都具有关键影响。事实上,小布什政府内部围绕朝核危机所谓“鹰派”、“鸽派”之争,实际上也很大程度上围绕对朝鲜发展核武意图的不同判断展开。^②

又如,面对中国政治、经济、军事的全面崛起,美国决策者首先迫切希望搞清楚的就是中国的战略意图。随着中国在国际体系中实力的进一步上升,究竟中国是偏好“现状”的国家,还是具有“修正主义”意图、试图挑战美国霸权的国家?^③对中国决策者来说,核心问题是美国的战略意图究竟是什么?是接触、遏制、围堵,还是防范、牵制,抑或兼而有之?美国提出希望中国成为国际体系“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究竟是给中国“下套子”,还是反映美国真实的战略意图?

这些对战略意图的诊断与分析,对于利益相关各方决策者形成战略判断、准备战略规划及进行战略决策都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④

其次是预测(prediction)。理论能够帮助决策者对国际事务发展的趋势和可能性做出预期,从而有助于战略筹划和应对。

譬如,如果朝鲜成功“晋身”成为核国家,那么东北亚的战略、安全环境将发生什么变化?日本、韩国因而走上核武装道路的可能性有多大?对中国的战略、安全利益将带来什么影响?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涉及对某一国际事件发展的可能路径做出预测。对于朝鲜意图、美日韩同盟关系、日韩国内政治动力机制等变量的不同的理论假定和逻辑推论则会导致不同的预测及政策建议。^⑤

① 肯尼思·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胡少华、王红樱译,王缉思校,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24页。

② 有关小布什政府内部对朝政策的争论,参见:Charles L. Prichard, *Failed Diplomacy: The Tragic Story of How North Korea Got the Bomb*, Washington, D. 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7; Mike Chinoy, *Meltdown: The Inside Story of the North Korean Nuclear Crisis*,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2008.

③ 有关中国战略意图转变和美国应对的分析,参见杰弗里·勒格罗:《意图转变:中国的崛起与美国的应对》,载朱锋、〔美〕罗伯特·罗斯主编:《中国崛起:理论与政策的视角》,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65—196页。

④ 裘援平指出决策者具有四个方面的需要:战略判断的需要、战略决策的需要、战略规划的需要及战略对话的需要。参见裘援平:《关于中国国际战略研究的若干看法》,第1页。

⑤ 譬如,有学者从朝鲜发展核武器主要是为了国家安全和政权稳定、拥有核武装使得国家变得更理性、日本反核情绪强烈等理论假定和诊断出发,提出“让朝鲜拥有核武器又何妨?”的观点。这和其他学者明确反对朝鲜拥有核武器的观点迥然对立。参见薛力:《让朝鲜拥有核武器又何妨?》,《联合早报》2009年6月18日;朱锋:《中国必须维护六方会谈尊严》,《环球时报》2009年6月4日第14版。

尤其重要的是,国际关系理论能够帮助决策者发现某一特定时代占据主导的力量,从而使得决策者对于外交政策运作的大背景有更深入的理解。譬如,从中国决策高层的视角来看,对下列“国际力量消长变化和发展趋势”的判断与预测就至关重要:

(1) 国际关系的“基本架构究竟是美国独霸,美欧协调,西方主导还是非西方挑战西方主导地位? 大国关系是否将进入一个传统大国与新兴大国相互适应磨合的新时期?”

(2) “俄罗斯在战略上究竟能走多远,是仅仅对西方通过北约东扩对其施行战略挤压做出强烈反弹,出口恶气、展示肌肉、露出牙齿而已,还是决意与美国进行战略对决、一争高下? 欧美联手应对新兴大国崛起、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的矛盾、拉美和中东一些反美国家的联盟趋势等,会不会形成一些新的力量组合和关系架构,为世界格局的演变增添变数?”

(3) “在全球化时代,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演变的规律是否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世界格局会不会从以大国谋霸、大国对抗为核心,转向霸权的相对衰退和多元制衡的增强? 传统国际力量对比和主导力量的构成会不会因为新兴国家的兴起和国际关系行为体的多元化而有所改变?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各国相互依存的局面,会不会改变国际体系的基本架构和国际秩序转换方式,改变大国关系和国际关系的零和性质,从而改变霸权国家兴替和新兴大国崛起方式?”^①

(4) 随着中国进一步全面崛起,美国这一现存国际体系的霸权国将如何应对? 现实主义特别是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的“进攻性现实主义”认为,中国强大之后必然会挑战美国霸权,中美必有一战,因此美国应当在中国强大到足以挑战美国之前遏制中国。^② 自由主义者特别是约翰·伊肯伯里(G. John Ikenberry)基于其“结构自由主义”理论对中国崛起和美国主导下的西方秩序的未来做出了更加乐观的估计,认为战后建立起来的美国主导下的国际秩序具有自由、开放、共识性(consensual)的宪政(constitutional politics)特征,不同于以往的零和特征的帝国秩序,能够容纳、同化中国这样崛起的大国,并且认为即使中国将来出现称霸野心,也不可能有能力颠覆现有的以自由主义为基础的国际秩序。^③

第三是提供政策处方(prescription)。

首先,理论能帮助决策者评估某一项政策的必要性与可行性。譬如,美国国内过去十几年中有关全球气候变化的原因、机制、后果等理论问题的共识的逐步形成,构成了奥巴马政府将全球气候变化列为美国外交政策中优先考虑的问题的重

① 裘援平:《关于中国国际战略研究的若干看法》,第2—3页。

② John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2001, pp. 401-402.

③ G. John Ikenberry, “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Future of the West: Can the Liberal System Survive?” *Foreign Affairs*, January/February 2008, pp. 23-29.

要基石。^①

其次,理论研究能够帮助决策者理解某一特定政策工具起作用的条件。譬如,威慑理论告诉决策者如果要成功遂行威慑战略,可信度(credibility)、信号的清晰度(clarity),以及将威胁付诸行动的能力(capability)三者至关重要。^②又譬如,有关经济制裁的理论研究帮助决策者理解制裁作为胁迫敌人就范工具(a tool of coercion)的局限性,并找出成功实施经济制裁的条件。^③

更为重要的是,理论能够提供一种分析性的框架,将特定的形势和战略置于更广阔的情景之中,从而有助于决策者制定和执行有效的政策战略。^④如果接受米尔斯海默式的现实主义理论,并且把其逻辑推到及至的话,那么所有的合作都是空谈误国,要做的是从现在开始厉兵秣马,加紧军备建设,以便为要到来的大国冲突与战争作好准备。和平至多只能作为“烟雾弹”或者战略欺骗的手段,而决不应该天真地把和平作为目标来追求。但是,现实主义逻辑最大的问题是具有自我实现预言的性质。如果毫无保留地接受现实主义逻辑,并照其进行战略规划,那么事实上也就成为了现实主义“零和”逻辑的俘虏。相反的,如果从自由主义的逻辑出发观察国际关系的话,那么这个世界的前途就并不是漆黑一片,人类并非就要注定陷入大国争夺霸权的冲突与战争的循环。

第四,避免决策陷阱。

首先,认知心理学理论能够帮助决策者避免某些认知偏见,从而提高决策效率和质量。譬如,一个典型的认知偏见是心理学家所谓的“信念系统辩护”(belief

① 参见 David Victor, *Climate Change: Debating America's Policy Options*, New York: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Press, 2004; Andrew Dessler and Edward Parson, *The Science and Politics of Global Climate Change: A Guide to the Debate*,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Kenneth Lieberthal and David Sandalow, "Overcoming Obstacles to U. S. -China Cooperation on Climate Change,"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s, John L. Thornton China Center Monograph Series*, No. 1, January 2009, see http://www.brookings.edu/~media/Files/rc/reports/2009/01_climate_change_lieberthal_sandalow/01_climate_change_lieberthal_sandalow.pdf, especially chapter 2; "Getting Warmer: Science Close in on an Understanding of Climate Change," *RAND Review*, Vol. 33, No. 1, Spring 2009, pp. 8-9.

② Alexander L. George and Richard Smoke, *Deterrence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Theory and Practic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4; Patrick M. Morgan, *Deterrence: A Conceptual Analysis*, Sage, 1983; Robert Jervis, "Rational Deterrence: Theory and Evidence," *World Politics*, Vol. 41, No. 2, January 1989, pp. 183-207; Lawrence Freedman, *Deterrence*, Malden, M. A.: Polity, 2004; Graham Allison, "Deterring Kim Jong-Il," *The Washington Post*, October 27, 2006; Robert Powell, *Nuclear Deterrence Theory: The Search for Credibility*,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③ 有关制裁研究的最新成果参见: Richard N. Haass ed., *Economic Sanctions and American Diplomacy*, New York: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Press, 1998; Danieal W. Drezner, *The Sanction Paradox: Economic Statecraft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Michael P. Malloy, *United States Economic Sanc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The Hague, London and Boston: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2001; Gary C. Hufbauer, Jeffrey J. Schott and Kimberly A. Elliott, *Economic Sanction Reconsidered*,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09.

④ Jentlesen and Bennett, "Policy Planning: Oxymoron or Sine Qua Non for U. S. Foreign Policy?" p. 225.

system defenses)。这一认知偏见使得行为体更倾向于从过去的经验中得出“我基本是对的”而不是自我反省式的“我错了”的结论,从而导致行为体拒绝接受新的信息,得出错误的历史教训。^①又如,将国家拟人化是理解国际事务的一种普遍方式。但是这种国家拟人化却隐含一个常见的“单一行为体”(unitary actor)的认知偏见,即认为任何观察到的对方的行动一定是有计划的、协调的,其背后一定存在一个集中化的统一意志。这也是导致“错误知觉”的主要原因之一。^②

其次,决策者经常会像“粗糙的经验主义者”(crude empiricist)一样习惯于试图在两个变量之间建立关联性。“如果A,一定B,”是很常见的决策者的思维模式。譬如“如果采取绥靖政策,一定会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如果美国售台武器,一定意味着美国支持台独、牵制中国”,等等。好的理论能够帮助决策者避免“单一变量”的决策陷阱,从而进行更加精细、复杂的政策分析。从事政策相关性理论研究的学者应当鼓励决策者避免过于简单化的把普遍性结论应用于政策分析之中,而是尽量考虑更多的相关变量,以及不同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③

四、实现双重超越的可能路径

如何实现双重超越,在“现代化”尚未完成的情况下应对“后现代”的命题,是中国国际关系学界无法回避的巨大挑战。下面关于实现这一双重超越可能路径的探讨显然是初步的,有待更充分的批评与探讨。

(一) 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区分“政策相关性”理论(policy-relevant theory)与“非政策相关性”理论,前者为政策导向(policy-oriented),后者为知识导向(intellectually-oriented)

两种理论应具有不同的前提假定与评价体系,各自在知识生产的劳动分工中占据不同位置,并不相互否定。知识导向型的理论研究可以是以数理统计、形式模型、博弈论等工具进行形而上的纯理论化研究。社会科学包括政治学、国际关系学知识的增长需要有一部分人在“象牙塔”内生产并不直接与政策产生关系的抽象、优美、深奥甚至晦涩的知识。这一部分知识生产的评价标准不是政策相关性或者

① Philip E. Tetlock, “Close-Call Counterfactuals and Belief System Defenses; I Was Not Almost Wrong but I Was Almost Right,”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Vol. 75, No. 3, 1998, pp. 639-652; and Tetlock, “Theory-Driven Reasoning about Plausible Pasts and Probable Futures in World Politics: Are We Prisoners of Our Preconception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43, No. 2, April 1999, pp. 335-366.

② Robert Jervis, *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6, p. 319. 王栋:《超越国家利益:探寻对20世纪90年代中美关系的知觉性解释》,《美国研究》2001年第3期,第31、33—44页。

③ George and Bennett, *Case Studies and Theory Development in the Social Sciences*, pp. 277-278.

有效性,而是逻辑阐释的清晰、力量及对于“真理”的接近程度。知识导向型理论并不对政策直接产生作用。一般的结构型理论都具有这种特征。譬如沃尔兹的新现实主义理论并不具有政策相关性,也不能以政策相关性作为其评价标准。如果说新现实主义对国际政治实践产生任何影响的话,这也是通过影响、渗透国际政治行为体理解世界的分析性框架、知觉和信念系统从而塑造其国际行为这样间接的机制在起作用。

乔治和本内特等学者对于“政策相关性”理论,特别是中程理论的发展提出了不少精辟的建议,如应当纳入决策者可以控制的可操作性变量等。^① 但是就中国国际关系学现状而言,“政策相关性”理论或者说政策导向型理论研究的当务之急是提高知识性和学术性,从时事追踪型、为官方政策做注解诠释的政策分析进展到具有理论功底和学术价值的政策分析,从而使政策分析真正具有“分析性”(analytical)。好的政策研究通常具有很高的知识性和学术性。^② 虽然政策研究形式上不需要照搬学术研究提出假设、搜集数据、进行验证的模式,并且事实上尽量应当避免理论研究所使用的抽象语言和工具,但是政策研究仍然应当遵循“知识追问”(intellectual inquiry)的逻辑与规范,因为归根结底,政策研究与理论研究一样,本质上都是追问,只是指向的目标、所要解决问题的性质不同而已。^③

沃尔特、奈等美国学者提出“回归政策”的命题,在美国情景下具有其自身的逻辑与合法性。美国国际关系学界出现的与政策现实越来越脱节、“为理论而理论”的倾向,是引起沃尔特、奈等具有现实关怀的学者不满,从而提出要把政策相关性“重新带回”政治学与国际关系领域的原因。^④ 与之相较,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与政策关系命题显然面临不同的问题与挑战。譬如,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不是“太理论”,而恰恰是“不够理论”,或者说徒有引介西方理论的“表”,而没有属于自己的理论创新的“里”。

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的问题不是政策相关性不够。事实上,恰恰由于学科发展处于相对不成熟和不完善的阶段,中国的国际关系学尚未出现像美国那样“高度工业化”所带来的隔阂与冰冷。相对较小的“知识共同体”使得学术界与政策圈

^① George and Bennett, *Case Studies and Theory Development in the Social Sciences*, pp. 279-281. See also, Jack Snyder and Robert Jervis, *Coping with Complexity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Boulder, C. O.: Westview Press, 1993.

^② 曾经担任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主席长达23年之久的克里斯托夫·德穆思(Christopher DeMuth)就认为智库和研究型大学一样都是生产知识和思想的地方,智库不仅为其自身,也应当为“改善世界”的目的而提供好的研究。参见 Christopher DeMuth, “Think Tank Confidential,” *On the Issues*, December 2007, pp. 1-5. see http://www.aei.org/docLib/20071228_4122553OTIDeMuth_g.pdf.

^③ 李侃如认为政策研究必须在去掉不必要的“学术外衣”之后保留“分析的复杂性”。参见 Lieberthal, “Initiatives to Bridge the Gap,” p. 14.

^④ Bruce W. Jentleson, “The Need for Praxis: Bringing Policy Relevance Back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6, No. 4, Spring 2002, pp. 169-183.

之间不但没有美国那么大的鸿沟,反而多少有点“鸡犬之声相闻”的味道,具有“前工业社会”的温情色彩。^①而长期以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更是直接服务于政策需求。因此,中国从事国际问题研究的学者对于政策的关注度可能平均来说超过美国的学者,甚至可以说普遍具有强烈的“政策情节”。^②这种理论与政策的“天然”更加紧密的联系,可以成为实现双重超越的比较优势。但是,中国情景下“回归政策”命题有两个潜在陷阱需要避免:第一,去理论化,回到“自然状态”(又回到过去时事追踪型的国际问题研究),或秦亚青所说的“前理论”(pre-theory)阶段;^③第二,被政治意志影响乃至主导,成为官方政策的注解、诠释或辩护。^④因此,提出“知识导向型”理论和“政策导向型”理论的分,倡导政策研究的知识性和学术性,有助于知识生产的合理分工,有助于避免中国情景下“回归政策”命题的潜在陷阱,并最终实现“双重超越”。

(二)“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提倡实证导向的研究,摆脱概念模糊、缺乏实证的“宏大叙事”,回到实证,在实证研究中对国际关系理论进行再思、批评与创新。

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就有学者开始提倡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的实证方法。秦亚青在1999年出版的对冷战期间美国在国际武装冲突中的支持行为的研究中运用了典型的计量统计方法,这可能是国内国际关系学界迄今仅见的运用数理统计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的专著。阎学通与孙学峰2001年出版的《国际关系研究实用方法》则标志着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对国际关系研究实证方法的第一次系统化思考。随着科学实证方法被介绍进入中国,国内主流的国际关系学术期刊中开始出现应用科学主义实证方法的文章。创刊于2005年的《国际政治科学》具有较为鲜明的科学实证主义倾向。尽管如此,不可讳言,科学主义实证方法在国内国际关系研究的应用仍非常之少,更没有形成以成熟的研究议程、富有成效的学术对话和争论为标志的可持续性的学术进程(秦亚青在其专著出版之后并没有继续科学实证主义的研究,而是转向建构主义,除了其本人学术思想的转向之外,恐怕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这一学术进程的缺失)。正如一份有关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现状

① 学术和政策文化意义上的隔阂显然是仍然存在的,但是两者却不像在美国那样具有方法论和认识论的鸿沟。这或许是因为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理论化”水平不高,尚没有生产大量决策者看不懂的形而上的“知识”。

② 有学者甚至认为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中存在着广泛的“政策焦虑症”,即学者总为自己的研究不能为政府所用而感到焦虑。参见王军、但兴悟:《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四十年》,第378—379页。

③ 秦亚青:《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进步与问题》;Qin Yaqing, “Why Is There No Chines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 Vol. 7, No. 3, 2007, pp. 313-340.

④ 在中国情景下,很多的外交政策议题具有很强的“政治性”和敏感性,这使得学者可能自觉或不自觉将“政治正确”内化到政策分析中。越靠近政策,这种紧张可能就越明显。而学者关注政策议题、希望参与政策讨论的愿望越迫切,则可能越容易落入这一潜在陷阱。

的评估报告总结道的：“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仍然停留在主观认证（或传统主义）阶段，缺乏严格的科学性。”这当然和数理统计、博弈论、形式理论等科学主义方法本身的“进入障碍”也有很大关系。^①

倡导以实证为导向的研究的同时，恐怕需要改变对理论进展的某些不正确看法。譬如，对国际关系理论“三大主义”式的脸谱化理解容易导致一个错误的假定，即理论的进展一定是“哥白尼革命”式的“范式革命”，一定是以一种范式颠覆、推翻另一种范式。事实上，任何成熟学科（如生命科学）某个理论的进步，很可能只是发现/证明某个具体的机制（如某种病毒的机理），并不是“大爆炸”式的。一般而言，理论对于知识的贡献主要是“边际性”的而不是对所有知识的总结。^②

少谈些主义当然不是不谈主义，而是应当超越“引介”式、“书评”式的国际理论研究方式。好的研究应当是问题驱动，而不是理论驱动或方法驱动。问题意识缺失、提不出好的问题，是困扰中国国际关系学理论进步的重大障碍。^③ 这里所谓的问题，应当包括但并不一定局限于“中国问题”。其实，暂且不论很多具有普世关怀的国际关系学大家如沃尔兹、基欧汉、杰维斯等，美国的国际关系学者所受的训练及其研究的出发点主要并不在提出“美国问题”，而是试图提出能够反映国际关系规律性的问题。^④ 譬如，美国国际关系学者对于战争根源的探讨，很少是出于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或者美国霸权的前提，更多的是试图理解导致人类冲突与战争的原因，进而理解人类实现和平的条件。^⑤ 众多美国学者对于国际道德、和平

① 参见王勇：《试论建立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实证方法：兼评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特色”》，《国际政治研究》1994年第4期，第34—40页；秦亚青：《霸权体系与国际冲突：美国在国际武装冲突中的支持行为，1945—1988》，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阎学通、孙学峰：《国际关系研究实用方法》，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门洪华：《关于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现状的评估报告》，《欧洲》2002年第3期，第97页。

② George and Bennett, *Case Studies and Theory Development in the Social Sciences*, p. 279.

③ 李巍：《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中的“理论进步”与“问题缺失”》，第23—30页。

④ 当然，美国学者的视角不可避免会受到美国文化、传统、观念及美国在国际权力分配中的主导地位等观念性和物质性因素的影响，但是这和美国学者以“美国问题”作为国际关系研究出发点的假定显然是不同的。在这点上，秦亚青认为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问题是“霸权护持”的观点似乎是值得商榷的。参见秦亚青：《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与中国学派的生成》，《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3期，第165—176页。

⑤ 美国学者有关战争根源探讨的主要论著，参见：Kenneth N. Waltz, *Man, State, and War: A Theoretical Analysi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9; Geoffrey Blainey, *The Causes of War*,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73; A. F. K. Organski and Jacek Kugler, *The War Ledger*, Chicago, I. 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1; Bruce Bueno de Mesquita, *The War Trap*,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3; Bruce Bueno de Mesquita and David Lalman, *War and Reason: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Imperatives*,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2; John A. Vasquez, *The War Puzzle*,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James D. Fearon, “Rationalist Explanations of Wa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9, No. 3, 1995, pp. 379-414; Dale C. Copeland, *The Origins of Major War*, Ithaca, N. 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0; Stephen Van Evera, *Causes of War: Power and the Roots of Conflict*, Ithaca, N. 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1. 事实上，对于美国外交政策最深刻、最犀利的批评很多时候往往来自美国学者，而不是其他国家的学者。参见资中筠主编：《冷眼向洋：百年风云启示录》，上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47—53页；王缉思：《美国霸权的逻辑》，《美国研究》2003年第3期，第25—26页。

研究、冲突解决等问题的探讨,更是反映普世的问题意识。因此,从一个意义上可以说,如果中国国际关系学者关注的都仅仅是“中国问题”,而无法从“中国视角”走出来,如果中国国际关系学者缺少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无法贡献真正具有普世价值的思想,那么很难想象中国能够真正成为合格的全球性领导国家。^①

(三) 复兴、重建历史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的地位

中国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包括理论、安全等领域)“去历史化”的现象需要平衡与纠正。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较为普遍存在的对于历史训练的轻视,导致不少所谓的理论论证缺乏历史的严谨和厚度,从而极大限制、约束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进展和做出原创性贡献的可能。^②

(四) 对下一代决策者的培养

这是奈等学者都提到的关键点。^③ 培养具有良好学术训练和理论修养,具备清晰逻辑思辨和分析能力的下一代决策者或许是实现“双重超越”具有根本意义的路径。当然,这对中国国际关系学界本身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① 对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缺少对人类命运终极关怀的批评,参见周桂银:《国际关系局部理论与当代史案例研究》,《史学月刊》2005年第6期,第15页。

^② 国内有部分国际关系学者呼吁重视历史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的作用与角色,但是应该说历史的重要性在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尚未得到充分的重视。参见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时殷弘:《国际政治与国家方略》,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张曙光:《冷战国际史与国际关系理论的链接:构建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体系的路径探索》,《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第2期,第7—14页;王存刚:《论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历史向度》,《外交评论》2008年第4期,第53—58页;《史学月刊》曾以“‘理解国际关系:历史与理论’笔谈”为题刊登时殷弘、周桂银、张小明、石斌、任东来和陈玉刚的专论,参见《史学月刊》2005年第6期,第5—23页。值得指出是,年轻一代国际关系学者中历史研究的自觉意识正在增长,并出现了历史与理论结合的优秀成果。参见秦治来:《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历史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3期,第14—19页;崔建树:《历史学与国际关系研究》,《国际政治研究》2007年第1期,第130—140页;周方银:《消耗战博弈与媾和时机的选择》,《国际政治科学》2007年第3期,第52—96页;孙力舟:《西汉时期东亚国际体系的两极格局分析:基于汉朝与匈奴两大政治行为体的考察》,《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第8期,第17—25页;陈拯:《作为修养与技艺的历史》,《国际政治研究》2008年第4期,第164—173页;向丽华:《对问题导向研究倾向的评估:以对外援助研究为例》,中国国际关系学会编:《评价国际关系理论:积累与进步——2007年博士论坛》,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年版,第52—53页;王军、但兴悟:《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四十年》,第383页。《国际政治科学》2006年第2期专门刊登了国内几位青年国际关系学者从国际关系理论角度分析晚清外交的一组文章。参见但兴悟:《从马嘎尔尼使华看国际体系之争》,《国际政治科学》2006年第2期,第1—27页;张效民、徐春峰:《晚清外交变化的观念因素》,同上,第28—58页;周方银:《清朝外交变化动因:观念还是物质》,同上,第59—84页。

^③ Ny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Relevance of Theory to Practice,” p. 651; Emily O. Goldman, “Closing the Gap: Networking the Policy and Academic Communities,” *Asia Policy*, No. 1, January 2006, pp. 20-21.